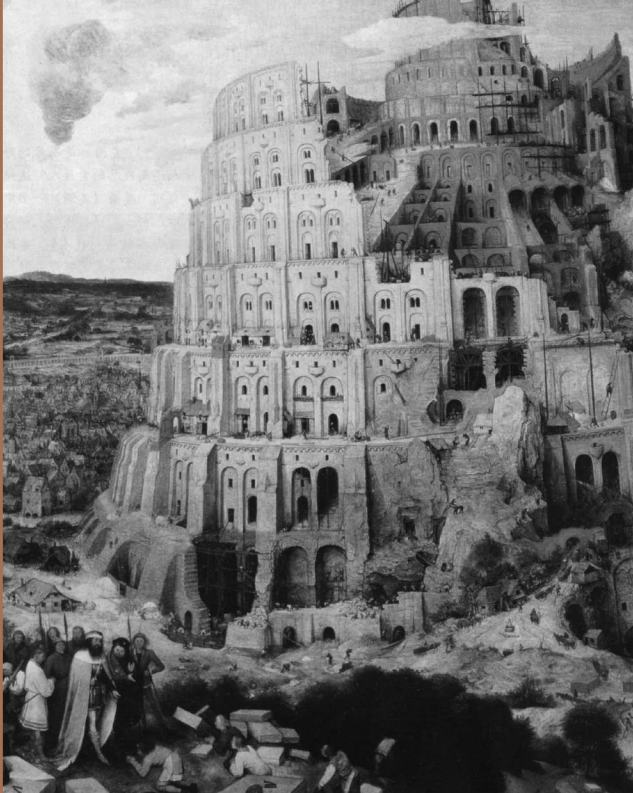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十四辑

城市史与城市文化

Urban History and Urban Culture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第十四辑

城市史与城市文化

Urban History and Urban Culture

主编 陈恒 王刘纯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史学. 第十四辑 / 陈恒, 王刘纯主编.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347-8104-9

I. ①新...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7414号

新史学 第十四辑

陈恒 王刘纯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郑强胜 梁金蓝

责任校对 钟 骄

装帧设计 王 敏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16号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37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35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编委会

主 编 陈 恒 王刘纯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 旭(厦门大学)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刘北成(清华大学)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

向 荣(复旦大学)

李剑鸣(复旦大学)

何兆武(清华大学)

沈 坚(浙江大学)

张广智(复旦大学)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

钱乘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Chris Lorenz(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Donald R.Kelley(美国拉特格斯大学)

Frank Ankersmit(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Gunter Scholtz(德国波鸿大学)

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Jörn Rüsen(德国埃森人文学科学研究所)

Jürgen Kocka(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Lucian Hölscher(德国波鸿大学)

Richard T.Vann(美国卫斯理公会大学)

-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以欣(南开大学)
- 王海利(北京师范大学)
-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 刘 健(中国社会科学院)
- 李隆国(北京大学)
- 宋立宏(南京大学)
- 张前进(大象出版社)
- 陈 雁(复旦大学)
- 陈 新(浙江大学)
- 郑强胜(大象出版社)
-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 周 兵(复旦大学)
- 孟仲捷(华东师范大学)
-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
-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 徐松岩(西南大学)
- 徐晓旭(华中师范大学)
- 彭 刚(清华大学)

- 合作杂志**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美国)
- History and Theory*(美国)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美国)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美国)
- Review*(美国)

WE ARE GRATEFUL TO THE ABOVE JOURNALS FOR GRANTING US
THE COPYRIGHT PERMISSIONS.

Contents 目 录

城市史与城市文化

- 1 历史上的城市 阿诺德·汤因比 文 倪 凯 译
- 20 中世纪欧洲城市 马克·博纳 文 屈伯文 译
- 39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卫生、洗浴和街道清理
..... 林恩·桑代克 文 唐诗卉、朱 明 译
- 48 12至14世纪意大利公社关于城市环境的管制
..... 弗朗切斯卡·波凯 文 唐诗卉、朱 明 译
- 60 前工业社会中城市贫困问题浅析 刘 敏
- 71 电影与城市 汉努·萨尔米 文 王 芳 译
- 86 为谁保护历史?——美国历史保护学的演进、批判与反思 李 娜
- 99 历史社会学初探 孙 琇
- 112 18世纪观察者及其后历史学家视野中的英国政治、文化与工业革命
..... 佩内洛普·科菲尔德 文 叶 亢 译
- 134 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徘徊在边缘与主流间的“少数族群”
..... 车效梅、常芳瑜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 146 历史书写的欧洲传统之三——作为预言的历史
..... 理查德·威廉姆·索森 文 李 腾 译
- 165 康德的历史理性思想研究 倪 凯
- 176 柯林武德历史叙事理论探析 张作成
- 188 马舍雷《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史》一文“引言”
..... 阿尔都塞 文 吴志峰 译

专题研究

- 193 希腊化时代和文明史 伯里文 焦汉丰 译
- 208 活力、秩序与重估: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陈素娟
- 217 国家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塞浦路斯问题 谢立忱、尹 婧
- 228 赫鲁晓夫的致命改革:党的机关的分立及其后果(1962—1964)
..... 赫列夫纽克 文 刘显忠 译
- 246 美国信息社会形成初探 石光宇

评 论

- 253 2014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 294 作为一个社会的罗马:《罗马史研究入门》书评 石晨叶

光启讲坛

- 299 国外非洲史研究最新趋势与中国的非洲史研究
..... 舒运国、包茂红、孙红旗、沐 涛、张忠祥
- 330 治学门径与方法——漫谈外国史料与史学 陈志强、陈晓律

文献与史料

- 348 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1970年1月) 阿尔都塞 文 吴志峰 译

城市史
与
城市文化

□阿诺德·汤因比
文 倪凯
译

历史上的城市

在最近的一段人类历史时期,城市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8000年或者9000年,如果考古学家对古城耶利哥(Jericho)的累积地层的最底层、最古老地层的年代测定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们采纳城市的兴起是从这一测定的时间点到现在之前,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一信息对于我们自身的意义。

什么是城市?

“城市”这个词首先在我脑海中显现的是具体的、直观的形象,我们映射出一簇簇排列紧密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这些建筑使如此稠密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在城市的有限范围内,城市的居民无法满足自身的食物供给,必须从环绕他们的广阔的农村地区“进口”食物。因此他们必须生产边远地区的食物生产者会接受的货物或者服务,或者两者皆有,以从食物生产者手中交换城镇居民所需要的食物。总体来说,在过去的八九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物质景象对位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城市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城市从来就不只是依靠售卖其他的物品而获得食物的人口的定居地。封闭的定居点并不被看做是一个城市,除非建筑区域的居民具有非物质意义上的集体社会生活,并且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种存在。这不一定必须要存在市长以及市政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形式,也可能缺乏正式的公民宪法,事实上城市的居民组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这一社会存在的意义,通常通过其存在地区的公共建筑的存在彰显出来,这些公共建筑有:拥有塔楼和城门的防御城墙,议定共同的商贸和政治事务的集会的阿戈拉(agora, 古希腊或雅典用于集会的市场; forum, 古罗马城镇的集会广场; piazza, 尤指意大利城镇中的广场; plaza, 西班牙语, 尤指城镇的广场; maidan, 南亚城镇或近郊的广场、空地), 至少也有一座城市守护神的神庙,或许还会有为城市的管理者提供办公场所的市政厅,如果城市的政府机构已经达到这样的组织程度。

如果这一评判城市构成的标准被接受,那么在前哥伦布时期的危地马拉(Guatemala)北部以及尤卡坦半岛(Yucatan)的玛雅社会的城镇中心也已经达到了城市的规模,尽管已经证明仅有少量的统治者以及神父长期地居住在这两个地区。从另一方面来看,同样的评判标准可能会要求我们否定那些名义上的“城市”,这些“城市”仅仅是一些由3000到4000名农业生产者组成的集合体,比如说当今发现的一个地方“米内尔维”(Minervino)以及意大利东南部其他类似的农业生产者的聚居区;一个聚居区的居民如果全是工业生产者也不会成为一个城市,就像在印第安纳州建筑物密集的噶里(Gary)地区,当城市的居民全是房东,就像在洛杉矶和迈阿密,这样的聚居区也不会成为城市。洛杉矶可能会机械地膨胀到次大陆的规模,但是在热带繁盛生长的肌体,可能永远不会成功地使其成为一个城市。要想成为一个城市,其同样需要心灵的演化,至少是心灵的萌芽,这对于城市时期的确立是本质性的。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的历史城市,同样具有成熟的劳动分工。在这些城市居民的多样化的职业中,他们已经创生了很少的有闲阶级来思考、计划、发明、创造——或者向另外的方向发展,将宝贵的空余时间浪费在奢靡、轻浮的生活以及战争上,这些空余的时间是通过他人每天工作产生的剩余产品而赢得的。有闲阶级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到我们所说的“文明”的文化发展阶段

的可能的证据。但是也有一些城市可以没有有闲阶级,只要那里存在某种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第一座城市耶利哥的居民在培育他们的绿洲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空余的时间节省下来,但是存留下来的、他们建造的城墙和塔楼证明,他们仍旧构建了一个市民社区。

从市民社会的意义上讲,城市曾经拥有像芥子种子那样渺小的命运。最早的城市就像稀疏地播撒在地球表面的小斑点,它们是人类定居点的特殊形式,它们的不同寻常通过城墙被象征和显现,这些城墙使微小的城市区域与围绕它们的广阔的乡村区分开来。在这些物质的防护之内,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得以且确实逐渐形成。希腊语中城市这个词“polis”最初的本义是避难处,并且避难处除一面环形墙外可能并没有什么组成物,这面环形墙围绕山顶,或者是围绕两聚合山谷之间的山脊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然堡垒而建。事实上,城市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仅仅是一个避难所而已,当开阔的乡村地区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暴力蹂躏时,城市周围乡村的人口可以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家禽、牧群以及收获物,在城中找到庇护。希腊语中的“城市”一词表明,希腊城市最重要和最优先的作用是安全,但是安全又给自由创造了机会。在中世纪的德国有一个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首先,城市的安全与自由是卓越的幸福,它们是如此的卓越,稀有的城市在最初人类创造的世界是十分伟大的

奇迹。但是,因为它们都是奇迹,它们内在具有向周围伸展、扩散和生长的倾向。在雅典的原初城市发展成为“卫城”(acropolis),当一个人口稠密的开放城市围绕着山脚结晶般成型,这意味着雅典卫城成为“顶级的庇护所”。小型的苏美尔城市乌尔通过扩展其商业贸易,向下经波斯湾进入印度河流域,向上通过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河谷到达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以及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河谷。

无法抗拒的城市扩张

这是对在我们这个时代将要成为过去的、城市与乡村物质联系衰退的较为早熟的预言。今天是乡村,而不是城市,成了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的特殊形式。在不久以前,世界上的城市仍旧在城墙的保护之下,以阻止被重新融入乡村的危险。“墙街”(Wall Street,华尔街)这个名称,保留了纽约城初建时期的物理结构的记忆。在德国直到19世纪,在中国直到20世纪,城市依然被城墙圈围,而且环绕周身的城门也会在晚上9点关闭。巴黎的城墙在18世纪30年代得到了增强,这些19世纪的壁垒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遭到毁坏(这些城墙并没有保护巴黎避免1871年的溃败,当然它们如果依旧存在,也不可能保护1940年的巴黎)。但是,在最近的百年间,开阔的农村地区已经开始陷入城市蔓延的逆向侵袭,城市已经突破了它们传统的界限,进入一个快速的区域扩张时期,我们再也不需要把城市

限定在我们的城墙之内了。城市现在已经不需要委身于城墙了,但是,我们确实试图用栅栏隔离我们的公园以及绿化带,以期望这样能够保护它们免受日益延伸的房屋和街道的覆盖。今天,公园和绿化带已经成为卓越的开放空间,它的空气使人从快速聚凝的世界城市的压抑气氛中解放出来,目前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已经不再是密林以及沙漠了,而是城市中的贫民窟,贫民窟中的人类歹徒已经成为比城市动物园中被有意圈养的狮子和老虎更加可怕的人类掠食者。在短短的八九千年的时间跨度里,微小的耶利哥、乌尔已经异化为东京、洛杉矶这样体量巨大的庞然大物。

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在地球表面日益增长的城市已经成为交织的人类命运之网的主线之一。城市化的进程与科技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城市的命运也密切受到更加多变的政治和战争的重大影响(较之于人与技术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人类最凄美的败笔,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最华美的胜利)。城市的历史已经成为人类的全部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理想的情况是将城市的历史放在全人类的发展情景中加以观察。但是出于实用目的,从相互交织的其他线索中分辨出人类命运的这一特殊线索是方便的也是可能的。我们现在可以追溯世界的城市从耶利哥到大都市的发展轨迹,芥子种子至多花费了八九千年的时间成长为覆盖整个地球的大树。据说在我们的时代,

如果我们避免毁灭性的核战争,20 亿年后地球依然是人类的居住地,那么城市在今后的 20 亿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人类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成功地消除了毁灭性的热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的威胁,已经发展为大都市的芥子种子,在我们可预知的未来将会成为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反过来我们也不必为克服这一威胁而感到绝望。到目前为止,为应对所遇到的一系列挑战,人类已经展示出了自身的机敏和坚定。本书的结语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意在使未来世界广泛分布的城市生活成为可能并且是能够让人接受的。如果我们想有效地与这一问题做斗争,我们没有时间去浪费。实际上,对 20 亿年后即将到来的世界城市中人类生活的展望,最好的、必要的方式是回到过去,追溯过去城市发展的八九千年间,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类似的城市。

在人类历史最初的 90 万年左右,人类已经演化成为食物的采集者,就像现今仍然存在于澳大利亚的一些原始种族一样。只有到最近的一万年或者九千年间,人类为了赢得生存,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才渐渐取得了对大自然的主动权。植物的种植以及动物的驯养不会早于这个时段,文明的伊始还要现代一些。在发现耶利哥连续的城市建筑堆积层之前,人们确信城市的出现不会早于文明时期,但是已经证明耶利哥城市堆积层的最底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并且一些存在于

中国北方的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Lung Shan)遗址也即将蜕变为城市,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依然可以构想他们那时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的新石器文化相比是年轻的。我们同样可以根据一些可信的证据做出猜测,新石器文化的耶利哥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考古发掘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至少有一座现代城市的居民与原始的耶利哥人相匹配。存在考古证据证明耶利哥最早的社区被入侵者毁掉了,这些入侵者侵占了这些遗址,并在消灭、驱逐或者吸收先前居民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苏美尔:宏伟的公共工程

新石器时代在新月沃地存在不止一个城市的证据,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一种推测,尽管这一推测是建立在耶利哥城市堆积层的最底层逐渐过渡到下一地层的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进入文明时代,将视线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扇形盆地的边缘转入盆地的腹地,我们遇见了完整的城市群,这些城市为自己的生存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尽管它们变得如此稠密。这种相对的富有是通过修建公共工程而实现的,公共工程的修建必定会要求对大规模的人类劳动进行组织和引导。他们将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雨林沼泽转变为可航行的航道以及可灌溉的沃土。苏美尔城邦国家领地内聚合的区域与地球表面人类定

居的所有区域相比是十分渺小的,但是与绿洲耶利哥的尺度相比,作为未来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征兆,其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事实上,这种趋势正是我们现在人类正在经历的。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苏美尔——以及后来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以及现在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最先出现完整城市群的区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这里就已经产生了城市群,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城市已经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现象。一两个世纪以后,在尼罗河的下游出现了第二个城市群,作为控制水利资源的成功范例,尼罗河下游的城市群完全可以和苏美尔地区技艺精湛的城市群相媲美。

约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在其他的其他地方形成了更大的城市,这些城市开垦了印度河中下游盆地广阔的雨林沼泽,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以及哈拉帕(Harappa)两座城市在这里兴起,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在爱琴海的岛屿以及周边大陆沿岸兴起,例如,克里特岛著名的有克诺索斯(Knossos)和费斯托罗(Phaestos),欧洲大陆的希腊有迈锡尼、皮洛斯(Pylos)、底比斯(Thebes)以及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在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亚洲大陆一侧的沿岸有特洛伊城。到公元前19世纪,在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中国北部出现了一座城市安阳,安阳的事例就像耶利哥一样,因为对于它自己的地方和时代来说,它是到目前为止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通

过考古学的证据——此处受到中国怀古的文学传统的支持——推测出大量的中国当代城市正在等待着考古学家铲子的发掘。因而,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市出现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中,城市这种人类的定居形式,早已从旧有世界向东西两边扩展,一直蔓延到可接触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在相同的1800年的时间跨度内,我们不仅仅看到了旧有世界城市的城市种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我们同样看到了这些城市不同的政治秩序。

战争中的城邦国家

在两河流域文明的伊始,每一个战胜了丛林沼泽,并且开始种植的城市,用政治术语来说都是一个“城邦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是周边区域的物质核心也是管理的中心,这一周边地区的广延是能够为这个唯一的城市提供足够的食物供给的。尽管苏美尔城邦拥有共同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它们与苏美尔社会依然处于前文化时期的边缘地区区分开来。每一个城邦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追求自由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个城邦开战。大概在早期艰难缓慢的垦殖过程中城邦之间还没有产生严重的冲突,在这一时期每一个城邦的领土还都是开垦而来,城市之间的领地被广阔的未开垦的雨林沼泽所隔绝,这些雨林沼泽阻断了由特定国家的近邻同时垦殖的区域。较低的两河流域最终垦殖的完成,是苏美尔的组织能力和科

学技术的胜利,但是它也使主权独立的城邦国家面临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它们的领地马上就要连在一起了,城邦之间领土的所有权以及水资源的使用权分歧必然会出现,并且既然它们是主权国家,它们处理这些分歧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诉诸战争。战争是考古学家已经发掘的最早的一些苏美尔文本的主题,并且这些遗迹中发现的碎片的记载足够使我们知晓,这些同族之间的相互仇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暴力,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直到最终将它们带入终结——至少是一个胜利的城邦通过强权统治了其他的城邦而带来的临时性终结。分散的主权城邦的集合被单一的世界性国家所取代,苏美尔阿卡德王国最终为苏美尔世界带来了和平。但是获得和平的代价是一系列残酷的淘汰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对生活、财富、幸福以及生产力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大多数其他文明在过去的 5000 年内已经出现并且开始了它们的进程,就像苏美尔文明,作为一系列邻近的独立主权国家的集合体,最终在一系列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被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所囊括。例如,希腊罗马的政治史,其源初的政治联合是城邦,就像苏美尔社会一样。作为罗马一系列征服战争的结果,希腊罗马世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实现了政治统一并且走向了终结。在东方旧世界结束后的中国,前哥伦比亚时代结束后处于新世界的中美、秘鲁都拥有相似的历史。前哥伦比亚

时代的秘鲁在印加帝国的统治下已经实现了好几代人的统一,前哥伦比亚时代的中美在阿兹特克帝国的统治下也接近于统一,不过西班牙的入侵打破了这一进程。在中国,互相争霸的当地各王国,最终被其中的一个王国“秦”用了 11 年(公元前 231—前 221 年)的时间武力统一,尽管秦帝国很快瓦解了,但是汉王朝很快再一次实现了统一,恢复了生机。自此以后的王朝崩溃,或早或晚,其都能恢复生机。其最近的一次崩溃是在 1911 年,其最近一次重新统一是在 1929 年,从那时起,中国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在现在的共产主义体制下,中国大陆与秦始皇在公元前 221 年建立的帝国是一脉相承的。

埃及的世界性国家

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而言,苏美尔文明的政治史所显现出来的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形式。然而,也存在一个标志性的且意义重大的例外,这就是埃及文明的政治史。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埃及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之后仅有的第二个文明。如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同样也起源于当地分散的社区的政治性聚合,但是在埃及世界,当地的社区是通过征服而联合在一起的,并且在文明的伊始就在尼罗河的下游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与苏美尔以及其他大多数其他文明一直等到当地城邦之间的一系列战争达到无法承受的暴力以及毁灭性时才最终实现联合不

同,埃及文明一开始就将自己囊括进埃及地区世界性国家的体系中,在埃及,文明和政治性的联合是同时代的。

作为埃及文明这一独特结构的政治史的结果,埃及的城市作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共同体,从未发展到苏美尔、希腊罗马、迦南以及中世纪西方世界城市的水平。埃及的城市成为经济、政权以及宗教的中心,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城市国家。埃及的世界性国家在很早的后新石器时代已经建立,这阻止了单个城市的政治性发展。在埃及,政治统一并不是持续的、没有任何中断的,埃及的政治史就像中国的政治史一样,存在间或的中断期,在这一时期内世界性的国家会发生暂时的分裂。在埃及,如同在中国,政权的统一总是不断地重建。在埃及统一一旦建立,政治的大一统也是统治性的,而政治的分裂成为例外。埃及的世界性国家时断时续存在了约 3000 年,并且处在一种扩张性的形式——罗马帝国——这种形式经历了埃及文明自身的灭亡。同样,在中国世界性的国家也时断时续地存在了 2000 年,并且今天它依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埃及文明在实现政治统一方面特有的早熟,使得对于埃及历史城市的新的政治规则的研究成为一个经典的领域,这些规则在埃及世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发挥了更早的作用。在苏美尔世界最初分裂的政治结构中,每一个苏美尔城邦本身都是他们当地城邦的核心。在埃及,一开始

就统一的政治结构中,并没有地方性城市的位置。但是,这里需要一个都邑城市为世界性的政府提供居所,这个都邑城市使得整个埃及世界,包括埃及的行省城市都要服从于它。

埃及世界一系列首都城市的历史是上下埃及角力的历史。埃及世界最初的统一是在被称为“古王国”的时期实现的,在随后的中王国时期第一次实现了再统一,在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每一次再统一都是基于上埃及对军队的掌控基础之上的。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考虑到与来自亚洲和利比亚的侵略相比,埃及世界开阔的南方边界更易于遭到侵略就能理解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南方的驻守人员相较于避居于内部的定居者来说,往往拥有更好的战争训练、更多的军事思维。因此,埃及世界暴力的统一与再统一,首先开始于赫拉康波里斯(Hieraconpolis),继而两次起源于底比斯(Thebes),是我们预想得到的。然而,已经证明从埃及世界的南部统治统一埃及要比从那里用武力迫使整个埃及世界的统一更加困难。因此,古王国一经建立,新统一的埃及世界的首都就搬离了帝国建立者的家乡,从处于遥远南部的赫拉康波里来到了孟菲斯。孟菲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开始展开的地点——一个地理位置更为便捷,非常适合作为国家统治中心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使整个埃及聚合为一个整体。因为这个原因,当埃及在中王国时期重新统一的时候,来自底比斯的帝国建立者,也迅速地

将帝国的首都由底比斯迁移到了新的地址以斯陶(Ith-tai),这个地区距离三角洲的起点并不远。到了新王国时期,由来自底比斯的另一位帝国建立者,实现了埃及的第二次再统一,底比斯这座城市才依然作为全埃及的首都延续下来,即使这样底比斯也没有长久地把首都的地位保持下去。在底比斯保持自身的地位200年后,革命性的帝国皇帝埃赫那吞(Akhenaton)将帝国的首都迁入了内地的一个新地址阿玛尔那(Tell el Amarna)。尽管埃赫那吞死后,底比斯再一次成为帝国的首都,但是这次恢复仅是暂时性的,来自西南亚日益增长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迫使埃及新王国第二次迁移了首都,这一次帝国的首都迁移到了位于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Tanis),这一地区位于巴勒斯坦(Palestine)入侵埃及的必经之路上。

在位于中王国和新王国之间的第二中间期这附近的区域就曾经作为过埃及的首都城市。在这段时间内,埃及曾经屈服于来自亚洲的入侵者希克索斯王朝(Hyksos)的统治,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阿瓦利斯(Avaris),这座城市处于横穿东部沙漠与他们的家乡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相连接的路线上。另一个更加著名的由外邦人建立的政权的首都都是位于三角洲西北部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对于其征服者来说在这里选址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征服者的军事力量储备,并不是来自亚洲大陆而是来自海外的希腊。埃及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控制之下,首先经

历了波斯人的继承者托勒密王朝(Ptolemaic)的统治,继而是世界性国家罗马的统治。从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的征服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将其从罗马基督教世界剥离出来,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1000年。

中国变动的首都

这样,埃及文明的政治史描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首都城市,这些相同类型的例子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有发生。例如,稍后的中国历史也阐释了边界地区与内部地区的拉锯战。安阳是商王朝最后一座都城,也是到目前为止发掘的最古老的一座中国城市,其处于中国世界的内部、黄河的中游。但是周王朝重新统一中国,其后秦帝国再次统一中国都是以渭河流域为根据地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西北边界要抵御强大的蛮族入侵,而且在这一方向上,蛮族给中国造成的压力是持续不断的。然而,中国的统一以及埃及的统一,在最终都趋向了同样的结局。在中国,或早或迟,首都城市同样地遵循了由渭河河谷到黄河流域中游的规律性转移。这在周朝的历史中发生了,并且在汉朝的历史中再一次发生了,汉朝是秦朝更为长久的继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世界扩展到长江流域,并且超越了这个范围扩展到亚洲次大陆东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世界的主要地理轴线也由东西横贯转变为南北纵伸。但是边界地区与内部地区的角力仍然是中国世界的政治史恒常的主

题,东西向的长安与洛阳的拉锯也被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的拉锯所继承。其他的例子也说明了中国密切遵循埃及历史的发展节奏,北京最开始是外族政权建立的首都,这个政权是由征服埃及的蒙古人建立的,后来被中国的本土继承者明王朝所接受。并且,上海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十分相似,一个世纪以来,在海外西方入侵者的统治下,上海都是中国经济、政治的前沿阵地,这种情形结束于日本对上海的短暂占领。

蒙古人的北京是与希克索斯的阿瓦利斯(Avaris)相同类型城市的一个例证。它是外籍蛮族入侵者的屯兵之城,这类城市建在被征服文明领土的边缘,集中在征服者与家乡建立联系的路线之上,以作为掌控和保持军队战斗力的基地。在苏美尔-阿卡德(Sumer-Akkadian)世界的历史中,这种屯兵型的城市以巴比伦为代表,这一“上帝之门”(Gate of Gods)大约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由说闪米特语的阿摩利人(Amorite)创建。像他们的前辈阿卡德人一样,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Arobia)北部的干旱草原,这些阿摩利人将巴比伦城建在幼发拉底河的西边,这里处在与他们起源的故乡相联系的路线上。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阿摩利入侵者渐渐地被当地先前的居民所同化,阿摩利人的巴比伦与蒙古人的北京以及希克索斯的阿瓦利斯拥有同样的命运,在成为外籍蛮族的驻兵城市后,巴比伦最终演化为世界性国家的首都。阿摩利巴比伦的建立者汉穆拉比

(Hammurapi)并不是实现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统一的第一人。历经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期,苏美尔阿卡德地区首先被阿卡德王朝的阿卡德统一,其后又被苏美尔的乌尔第三王朝统一。这两个先前统一的王朝都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阿摩利人的巴比伦第一王朝也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巴比伦城完成了帝国的命运,而阿卡德与乌尔没有成功地保护自己。从公元前18、1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150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持续作为一系列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城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两河流域下游的灌溉农业的剩余农产品基础之上的。在巴比伦城辉煌的顶峰过去之后,它的影响通过它邻近的城市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些城市往往是一些新建的政治性城市,事实上它们仅仅是巴比伦的替身而已。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希腊塞琉古王国的“巴比伦城”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Seleuciaon-Tigris);塞琉古王国的继承者安息伊朗(Arsacid Iranian)以及安息伊朗的继承者萨珊伊朗(Sasanian Iranian)的“巴比伦城”是泰西封(Ctesiphon),这座城市位于塞琉西亚的郊区靠近伊朗一侧的底格里斯河岸边;萨珊伊朗的继承者阿巴斯王朝(Abbasid Dynasty)的“巴比伦城”是巴格达(Baghdad),位于与泰锡封同侧的底格里斯河岸边,稍微处于泰锡封的上游。阿巴斯王朝军事力量的驻守城市,同安息帝国一样是呼罗珊(Khorasan, 先前以帕提亚[Parthia]而闻名),因此它们在伊朗的边境、两河的东侧建立自己的

巴比伦城的替代城市——巴比伦尼亚的经济助推器。

阿巴斯的巴格达、撒珊和安息的泰锡封、阿摩利人的巴比伦以及希克索斯的阿瓦利斯,给予我们如此多的驻兵城市的例子。不过这种驻兵城市的最经典的例子是公元7世纪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为了保持其强大的帝国的安全创建的驻兵城市。这些城市向东延伸到阿姆河的上游,向西延伸到西北非洲,这些征服的实现是在极短的、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是十分令人惊异的。像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阿摩利人、公元前13世纪及其以后的希伯来人以及阿拉姆人(Aramaeans)一样,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人已经突破了阿拉伯半岛并且同时向两个方向扩张——西北方向侵入巴勒斯坦、叙利亚,东北方向侵入伊拉克。不同于先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说闪米特语的入侵者掀起的入侵浪潮,他们征服伊拉克后,继续征服了更远处的伊朗以及中亚;征服巴勒斯坦后,他们继而征服了更远处的埃及以及西北非洲。阿拉伯人在每一个其征服的农耕文明的边缘,都会沿着沙漠与农耕区的分界线建立驻兵城市。他们沿着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的沙漠边界建立了四座这样的城市。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起点、尼罗河最东部的支流靠近阿拉伯的地区建立了福斯塔特城(Fustat),这座城市距今开罗仅有很短的一段距离。他们在突尼斯(Tunisia)的带状绿洲的东南部边缘建立了城市盖

罗湾(Qayrawan)。但是穆斯林阿拉伯新建的所有这些驻兵城市中最重要的是位于阿拉伯与伊拉克边缘的城市巴士拉(Basrah)和库法(Kufah)。这两座阿拉伯驻兵城市,如同阿摩利的巴比伦,坐落在幼发拉底河的东岸,这个城址与他们的军事储备力量阿拉伯半岛的联系不会被任何水道切断。在倭马亚王朝(Umayyad)的统治之下,穆斯林阿拉伯的征服者不仅控制了伊拉克,而且通过巴士拉和库法两座城市控制了伊朗和中亚,然而倭马亚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坐落在大马士革(Damascus),大马士革是建于阿拉伯半岛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边缘的四个驻兵城市之一。当倭马亚王朝以及它的阿拉伯军队被阿巴斯王朝(Abbasid)以及它的呼罗珊伊朗(Khorasani Iranian)军队所取代,由于呼罗珊的驻兵城市是巴格达,所以在底格里斯河靠近伊朗的一侧,巴格达不仅取代了大马士革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而且也取代了在幼发拉底河靠近阿拉伯一侧的库法和巴士拉控制帝国东北部主权的作用。

城邦的幸存

科技发展的进程已经对城市的演进起到了决定作用,在城市向前发展的每一个相继的阶段,科技活动的规模都早已得到了扩展。城市化与科技进步两者之间的关系注定了城邦会被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都城所取代,这包括边疆成百上千的行省城市。我们这个时代科技在快速发